

绪 论

一、课题来源与研究对象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现代化发展经历了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现代化的努力都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但前一个时期的现代化发展因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而最终走向失败。导致这场历史悲剧的原因很多，显然，战前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政治的确立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中，国家主义对日本政治的影响，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对日本的现代化起到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因此，国家主义在不同时期与日本政治的关系有着历史的特殊性。同时，由于日本是一个东方国家，所以这种特殊性还包含有一定的文化意义。

当我们提出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这一词语的时候，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何谓国家主义？日本的国家主义有什么特征？其自身的变化历程是怎样的？战后日本的国家主义又是在何种意义的层面上区别于战前的国家主义？最重要的是所谓新国家主义，“新”在何处，与之相对的又“旧”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是在我们进行论述之前必须弄清楚的。

但是，这的确是一个比较难以下定义的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曾经说过，研究的过程中有时“分析优于定义”^①。我们在此更多采用的也是用分析的办法来认识它，而不是先给它下定义。由于其使用的语境在战后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变化很大，其内容又有着各种各样的要素和表现流派，范围很广，所以这种分析也只能是多侧面多角度的。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我们在此对日本国家主义以及新国家主义的考察，有着明确限定的讨论范围。一个是理论的限定，一个是研究对象范围的限定。从理论上讲，目前人们谈及国家主义时，往往会在非明确的意义上与一些词语发生含混的关系。如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等。这些词语因为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含义差别很大，因此首先必须明确我们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它们。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这些主义和学说，所以我们并不使用专门的文字论述这些词语的具体意义，而仅仅在此让大家知道在何种意义上，在怎样的限定情况下使用它们来说明日本的新国家主义。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对日本新国家主义进行认识和批判，我们将据此把要讨论的问题集中于必要的范围之内。

无疑，提到日本国家主义，每个人都会首先想到战前日本极端国家主义，即天皇国家主义。想起它留给亚洲被侵略民族、日本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惨痛记忆。但是国家主义在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发挥它的作用时，又显然并不是发端于日本，也绝非在日本才体现了它的“正”的或“负”的功用。日本战前国家主义被称为极端，是因为它的发展形式和内容超出了其本源意义上的界限范围，即将日本民族所谓的“独特品质”和“个性”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义相结合才形成

经济学消息报社主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评说中国经济与经济学发展》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5 年 第 134 页。

了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

从源流上考察，古典国家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政治理论，它具体表现为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一种政治思潮，主要是指在界定国家与个人关系的问题上所持有的相互对立的态度。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个人优先于国家而存在，社会各个层面的规范，其制定的出发点和中心以个人为主，即为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与此相反，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中，国家优于个人而存在，社会的相关规范以国家为中心，个人利益只有纳入到国家利益体系中才能得到保障，就是国家主义的政治理论。

客观地说，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种有关国家理论的政治学说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都曾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关于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以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理论的联系、区别与对立，在第一章第一节中我们将更为详尽地予以阐述。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国家主义特别具有对抗宗教特权和封建割据的积极功效和意义。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英美等国显然是以自由主义的国家学说为其治国理念的，而德奥等国则是以国家主义的政治理论为指导发展起来的。国家主义政治理论在德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无疑曾收到了现实的功效，使德奥等国家在当时相对落后于英荷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快速追赶并超过了他们。

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在建立近代国家体制的时候，在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历程与状况的前提下，选择了以德奥式的国家主义理论为其政治理论的基础，并以德奥为样板，开始了日本的近代国家体制建设。事实证明，这种选择不仅适合日本东方式的文化，甚至更发扬了、或者说是强化了东方式的集体主义观念和行为，最大限度地聚合了日本国民的能量。这种思想理论在日本建立近代国家之初，体现了它的功用，帮助日本完成了国家战略目标，即抵御外族侵

略，追赶欧洲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与此平等的地位，进而加入到其队伍中去。但另一个后果是，日本却由此开始了被称为是“丧失了国民的近代”^①，并进而开始对其他亚洲邻国野蛮的侵略。假如日本在以国家主义理论为指导，迅速完成建立近代国家的历史任务之后，不是继续沿着国家主义路线走向“极端”，而是适当纠正国家主义在日本形成“国民”方面的负面作用，那么，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的失败。但是，日本的当政者显然高估了国家主义的作用，以为它是万能的工具，终于走向反面，将其推向极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正如有的学者在考察日本国家兴衰的历程时所指出的：曾经把国家引向兴盛的成功要素，经过若干年的变化，有可能成为使国家衰退的因素而发挥相反的作用，可以说这既是历史的矛盾，也是历史的某种必然。换言之，看似繁荣的同时往往已经潜伏着使其没落的要素和原因了。^②

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根本上是以天皇制国家原理作为其特质的。所谓天皇制国家原理，与把主权者的行为作为统治正统性的绝对主义不同，它把天皇作为国家终极价值的绝对体现者。天皇制以握有作为绝对权力的天皇为顶峰，由行政官僚和军事官僚以天皇名义行使统治权，通过军人敕语和教育敕语使臣民对天皇忠诚，由此完成国家的统一和国民的统合。天皇制国家就是这种靠制度和意识形态来支撑的庞大建筑。^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日本的战败，无疑宣告了日本极端国家主义的彻底失败。旧的体制可以被无情摧毁，取而代之以全新的体

① [日] 小路田泰直：《国民‘丧失’的近代》 吉川弘文馆 1999 年。

[日] 西川吉光：《后冷战的国际政治和日本的国家战略》，晃洋书房 1993 年第 190 页。

③ [日]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三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 周启乾等译 第 225 页。

制 但支撑那个旧体制的思想 却不可能通过一场战争的胜负完全决定其去留。旧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阶层，当然不甘心原有利益的丧失。还有那些思想意识观念被旧体制深深浸润而无法用自身理性精神来批判的人 他们纠合到一起 怀着复杂的心情 夹杂着仇恨、伤感、失落乃至迷茫的痛苦 会在新体制的建设过程中 以各种各样复归旧体制的形式来进行抵制。

如果以时间作为分界的话 战后这部分人对新体制的抵制 以及以战前国家主义内容的部分复归为指向而展开的种种活动，就可以视为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的出发点 如果从内容角度考察 因为这些提倡复归战前体制的人们也明白 时过境迁 完全复归战前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他们也是力求改头换面，并不追求极端国家主义的全部复归，而是力求复活旧体制中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那部分内容。这样 不管从时间上还是从内容形式的改变上看 战后国家主义者对新体制的抵制和对旧体制中某些要素的复归追求，当然也都可以称之为战后新国家主义的开始。

这种以部分改变内容形式但却以复活战前国家主义为显著特征的新国家主义在战后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但是，复归战前国家主义毕竟是悖逆于历史潮流的行为，注定会遭到接受了战后民主化洗礼的日本人民的批判和斗争。因此这股逆流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不得不变为一种蛰伏的潜流，未能明目张胆地浮到日本政治的表面上来。这股逆流重新以新的面目登场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曾根政权开始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中曾根政权为分水岭，开始了战后日本政治的新阶段。中曾根所标榜和力图完成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以一种象征意义发挥了中曾根本人所阐释作用之外的某种历史功用。因为中曾根在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时，虽然还是面对其政权之前的日本战后 但同时他对其政权之后的日本社会、政治局面乃至世界的大变

动在某种范围内也进行了大胆的展望，只是他不会想到其后并不久远的 80 年代末，苏联会解体，冷战会结束，两极对垒的世界格局会顷刻间土崩瓦解。所以，中曾根在对战后“政治决算”之后的展望还是在冷战格局的框架内；同时他也没有想到与世界格局变动相连的日本“五五年体制”的崩溃，自民党长达 38 年的“一党优位政权”会以那样的形式和结果，即以日本政坛的全面保守化为最终结局。可以说自民党交出“一党执政”的执政党宝座时，却取得了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思想胜利，同时也获得了社会层面上的现实胜利。而社会党在获得执政党权力的同时，却一败涂地，乃至丧失了原本的存在。这政权的一交一接、一失一得，与长期斗争后的一胜一负，如此滑稽的倒错局面，是当时在进行“战后决算”而同时梦想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中曾根政权完全没有想到的。这一过程耐人寻味，更发人深省。

所以，中曾根政权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在宣告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已经告一段落的层面上来说颇具象征意义；在宣布日本政治开始了一个新起点的时候，即在“决算”的基础上整装待发，准备要大步前行的层面上也颇具号召力，在面向未来，以树立政治大国为目标的层面上，更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乃至其后日本人的某种期望或向往。这些都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国家主义的层面上，中曾根政权同样也具有与此一致的象征意义。他的新国家主义主张是新旧混杂的，既有政治大国的新主张，也有宣传天皇意识形态、参拜靖国神社等复活战前国家主义意识的某些成分。因而，他的新国家主义受到了当时来自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使其带有复活国家主义意识成分的所谓新国家主义政治大大受挫。

新国家主义成为日本社会的主要思潮之一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战后日本社会思潮，尽管经历了诸多变迁，但有着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与国际和日本国内的冷战结构相联系，存在着和平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严重对立。

但是这种左右两极对立的结构到 90 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代之以新民族主义也就是新国家主义思潮和改革思潮的兴起。②

发生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是国际、国内冷战结构的崩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这就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东西冷战结构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宣告结束。冷战的结束，给日本社会以很大冲击，使过去一直与自民党对立的社会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在国民中的支持率与影响迅速下降。为了谋求继续生存，社会党被迫进行体制和基本政策的转换，并且在转变现行路线的同时，于 1994 年与过去几十年的宿敌自民党联手组成联合政权。

社会党的这种举动终于使其与自民党的区别模糊不清，也就使其自身更加衰落下去。1996 年 1 月，社会党更名为社民党。在民主党成立后 社民党的许多成员被其吸收 社民党在国会中的力量已非常弱小，在国民中的支持率也不断下降。民主党在基本政策上与自民党也没有明显的对立点 区别也越来越模糊。有调查分析 现在各政党除了日本共产党外，其他各党虽然有区别，但区别已经很不明显。在安全防卫、修改宪法等方面 民主党与自民党更是没有什么实

在日语中，关于新国家主义和新民族主义这两个词语，如果用汉字表达 有“新民族主义”和“新国家主义”不同的两个词汇 它们在使用时具体表达的含义是有差别的。如日本学者德本正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曾指出新国家主义和新民族主义的关系：“新国家主义是日本新民族主义的路线化”。但是，在一般的语境下，若使用外来语则都会用 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 来表达。这时，新国家主义和新民族主义基本上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即以国家或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本质上追求“扩张民族利益”的目标。所以，在本文中使用时 新国家主义这一词语时，涵盖了新民族主义同样的内容。并且为了追求行文的一致 除特别注明外 对日文文献中的 ネオ・ナショナリズム 均翻译为新国家主义来使用。

崔新京：《90 年代日本的社会思潮浅析》，《日本学刊》2001 年第 2 期。

质性的观念分歧。^①

与各政党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相辅相成，日本国民中也出现了总体保守化、非意识形态化的现象。其最鲜明的标志，是庞大的无党派阶层的出现。据统计，现在日本选民中固定支持政党的只有 50% 左右，而支持无党派阶层的则占到了选民的一半以上。这说明，日本国民开始渐渐远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这使得以标榜现实主义和信奉意识形态为特点的社会舆论对国民施加影响变得更加容易，为触动战后以来的一些思想言论禁区，转变战后所选择的国家发展路线准备了土壤和条件。

冷战的终结还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 即旧的秩序被打破 新的秩序有待建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在世界事务中的比重增加。这又为日本依靠经济力量在世界上增大发言权提供了机会。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前，由于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和估计到泡沫经济崩溃的深刻影响，基于对日本经济实力自信的外向性国家主义日渐抬头并一再强化 而 90 年代后期 泡沫经济破灭之后 日本人相反又产生了一种幻灭感，同样试图通过新国家主义的手段来重新唤起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信心，以支撑日本社会尽快走出经济、政治动荡时期。这样，以经济增长强势为心理基础的外向性新国家主义，又转变成了以弱势危机心理为基础的内向性新国家主义。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说 对战后国家主义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

^① [日] 浦岛郁夫：《全国会议员意识调查》，《中央公论》1999 年 5 月号。

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1960年。20世纪50年代以丸山真男为代表,以西方近代政治理论为基点,对日本战前和战后的国家主义进行了连续性的分析和批判;与此相对,20世纪60年代初以吉本隆明为代表,强调从日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基础层面着眼,对日本国家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思想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思考。吉本隆明所谓“丸山批判”,并不是对丸山真男的思想理论进行全面否定,而是一种补充,他力求弥补丸山真男从西方近代政治史的角度对日本国家主义批判的不足。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安保斗争之后,日本进入经济主导时代,整个社会的注意力都投入到经济发展之中,战后国家主义思潮不得不沉伏下去,成为日本社会的潜流,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批判也不再为世人所关注。事实上,丸山真男经过60年代漫长的准备期,到了70年代之后开始讨论日本文化的“古层”^①问题时,他放弃了使用西方式概念的意图,开始尝试在日本的本土语境中寻找关键词来解释日本历史形成的思维特性,以完成他一生所致力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解释日本近代思维的深层结构,特别是国家主义乃至天皇制所产生的精神风土。^②但是很显然,丸山真男的后期研究并没有引起当时世人的注目。这一方面因为丸山的思想本身有值得商榷之处,而他的表

^① “古层”又称“原型”。指日本的思想史是对外来思想的受容、修正和摄取的历史。不断摄取的外来文化,在日本人的精神结构内部,形成不同的层次,并促使新生层次与古层之间不断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沉积于下层者,就被称为“原型”或者“古层”。此解参见韩东育:《丸山真男学术立论中的事实与想像——原型论与日本主义情结》,《日本学论坛》2002年第3—4期。

^② [日]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史中的〈古层〉问题》,《丸山真男集》第十一卷,1979年第124页。

述也过于复杂，难于理解，但更重要的则是因为后期丸山的论文发表在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期，这与当时的社会氛围有着明显的不谐和性。

第二阶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曾根政权之初开始，差不多贯穿了整个 80 年代。由于中曾根“战后政治总决算”提出了新国家主义的政治主张，国内外社会各界都对此提出了严厉批判。主要有中岛诚的《新国家主义的理论》（日本工业出版社 1981 年版）德本正彦等的《日本的新民族主义》（九州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森田俊男的《新国家主义批判——以教育改革为名的国家改造》（平和文社 1986 年版）佐和隆光等的《80 年代论》（新曜社 1988 年版）杉本良夫等的座谈纪要《注视新国家主义的波涛》（《中央公论》1988 年第 1 期）等都是对中曾根执政前后新国家主义政治的批判、研究和论述。特别是《中央公论》和《文化评论》等杂志在 1986 年都出版了专门登载相关内容的特集，发表了社会各界学者的系列论文。但是这一阶段的批判，基本上是对中曾根政治的现实批判，对思想性的研究讨论并没有大规模展开。

第三阶段，当日本社会进入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冷战结束，日本社会和政局步入某种动荡之中，围绕新国家主义以及相关问题的论争开始激烈、频繁起来。但是，这种看似热烈的争论，并不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想理论的探讨而提出，而是被当做一种解决日本社会各领域问题的手段理念而展开的，因而这一论争当然也就相应停留在了对日本政治发展方向这一对现实政策思想进行探讨和论争的层面。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的新国家主义呈现出与之前明显不同的特点，即这一阶段的新国家主义是由上下两个层面构成的：一个是“来自上面”的新国家主义，主要表现为以“普通国家”论为中心的新大国主义政治思潮，一个“来自下面”的新国家主义即以“新自由主义

史观”为代表的新民族主义社会思潮的抬头。90年代新国家主义可以说是在80年代中曾根新国家主义思想基础上的进一步前行和扩展。这两种来自不同层面的新国家主义思潮上下交织，对当时以至于之后的日本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跨世纪的日本似乎还在不断地加剧。正因为如此，它引起了中外各界学者包括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国际政治理论家等不同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因为这种政治思潮并没有在日本形成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尚在流动和变化之中，特别是它的内容涉及日本的历史观问题、修改宪法问题、日本军备问题以及日本国家发展方向问题、民族主义精神的重建问题等各个领域的更多层面，因此学者们也多是不同的层面、在各个领域分别展开了各自的研究。甚至可以说，在中日两国近年来众多有关日本政治和政治史研究的著述中，无一不对此问题有所涉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该问题的现实意义。如日本学者浅井基文的《日本新保守主义》（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从新保守主义政治的角度对小泽一郎的新国家主义思想进行了详尽的剖析；另外饭田桃的《政治改革和九条改宪》（论创社1993年版）、猪口孝的《日本——经济大国的政治运营》（东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志田なや子的《小选举区制和新国家主义——两大政党论

① 20世纪9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史观”为代表的社会思潮之所以在此被称为是新民族主义思潮，而不被称为是新国家主义思潮，是因为宣传“新自由主义史观”的人并不是国家权力的代表者，他们大多是以公众代言人的身份，从历史认识和社会批评的角度将自己的观点渗透于大众层面。他们之所以标榜自己的观点属于所谓的“自由主义史观”就是为了表明其自身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其目的是以从政府官方的姿态博取已经对日本政治深感失望的日本公众的认可。但是在本质上，他们与新国家主义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即以实现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为目标，以日本民族利益为至上原则，不惜篡改历史真实，宣扬为日本民族之“公”，事实上就是为日本国家利益而牺牲国民利益的思想。

的虚构》(こうち书房 1993 年版)渡边治的《政治改革和宪法改正——从中曾根康弘到小泽一郎》(青木书店 1996 年版)山口二郎的《危机的日本政治》(岩波书店 2000 年版)姜尚中、森巢博的《国家主义的克服》(集英社 2002 年版)等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对 90 年代日本政治与新国家主义相关的问题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特别是渡边治的《日本大国化与新国家主义的形成——天皇制国家主义的摸索和障碍》(樱井书店 2001 年 8 月版)从战后天皇制度的变化角度对新国家主义在战后的演变进行了比较详实系统的论述。

中国学者如王振锁的《日本战后五十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林尚立的《政党政治与现代化——日本的历史与现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王新生的《现代日本政治》(经济日报社 1997 年版)蒋立峰主编的《日本政治概论》(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刘江永主编的《跨世纪的日本》(时事出版社 1995 年版)李寒梅等的《21 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刘江永的《彷徨中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徐静波等编的《战后日本的主要社会思潮与中日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等书中对新国家主义的政治思潮以及对日本政治的影响都有所涉及和相关论述。但是,因为这些著作并不是就新国家主义与战后日本政治之间互动关系所进行的专门理论阐述,因而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对该问题的认识深度和系统性。

从国内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来看这方面的论文也并不多,主要是对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某一阶段的某一方面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如王魁博的《中曾根‘新国家主义’的思想特征》(《国外政治学》1987 年第 6 期)古运全的《论中曾根的‘战后政治总决算’》(《日本问题研究》1988 年第 4 期)黄大惠的《试论战后日本的新国家主义思潮》(《外国问题研究》1990 年第 1 期)刘映春的《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小泽一郎》(《日本学刊》1996 年第 2 期)金熙德的《日

本政治大国战略的背景、理念与论争》(《东北亚学刊》2001年第1期)崔新京的《90年代日本的社会思潮浅析》(《日本学刊》2001年第1期)等等。

另外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对与本课题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粗浅的探讨,并先期发表在国内的各种学术刊物上。主要有:《中曾根〈新的保守理论〉中新国家主义思想评析》(《日本研究论集》2002年第7期)《民族意识的冲突——日本不同历史观根源探析》(杨栋梁主编《变动期的东亚社会与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试论天皇在战后日本政治社会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本研究》2003年第3期)《论日本新国家主义的演变》(《现代日本》2003年第2期,并被收入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编《在现代中国‘新展开’的日本研究》丛书)上述拙文也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部分内容和观点。

尽管如此从以上的考察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外对该问题系统性、全面性、综合性的研究尚未展开主要还是分领域的、阶段性的论述。特别是从日本战后政治发展的全历程考察新国家主义演变这一角度所进行的更深入的研究,目前还没有见到。

三、研究方法、论点与创新

基于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并非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思想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点,我们对此的认识也就不能从政治思想这一单纯的学科角度来对待它。换言之,力求从历史学以及政治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或者说交叉学科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所谓政治社会学,就是在政治分析的基础上,强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来研究政治现象、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假定是政治现象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密切联系的特殊社会现象。政治现象产生于社会环境，它受其他社会现象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有力地制约和影响这些现象。^①所谓历史，用汤因比的话说，“就历史这个词的客观含义而言，历史不是一连串的事实，历史著述也不是对这些事实的叙述。历史学家与其他的人类世界观察家一样，必须做到让人能够理解事实。”^②当然，理解不等于认同，更不等于赞同，它不包含丝毫使对方合理化和正当化的意图。因此，哪怕是站在反对的立场上，你仍然可以“理解”它。在此起决定意义的是“他者”意识。只有把“他者”作为独立的存在，并且承认“他者”具有“他在”的语境，才有可能从内部理解“他者”而不被其简单同化。作为历史学，理解“他者”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在此，我们试着通过政治社会学的思维角度去历史地“理解”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这一变化着的思想与政治。

那么，究竟如何评价战后新国家主义在战后政治中的地位呢？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思想绝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总是为一定目的服务的，它是一定历史时代与环境的产物，而不是超历史的、纯粹思维的产物。任何政治思想都有为谁而用、为何存在的问题。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想究其实质是为日本国家统治者服务的一种“工具”，它在日本战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起伏，无疑取决于这种“工具”对其时国家的统治者发挥何种程度的功效。战败之初，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统治集团认为，国家主义的核心“国体”是维持他们统治体制延续的最重要工具，于是拼命用此来抵抗战后改革；50年代，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第 20 页。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刘北成等译 第 423 页。

国家主义的某些因素之所以成为统治者推行“逆行路线”的手段，也是因为它适应当时的“祖国重建”、“反共”、“重新武装”等政治统治的需要。60年代以后，国家主义不得不变为思想乃至行动的潜流蛰伏起来，是因为统治阶层清楚地看到它在表面的存在将激起战后接受了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洗礼的社会民众最激烈的反对。如果反对运动继续高涨，必将危及统治阶层的政治稳定。到了80年代，当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统治阶层重又开始尝试发挥国家主义思想要素在日本实现“政治大国”这一新的目标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效；一直到90年代，面对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日本政治、经济、社会都进入新的转型动荡期，新国家主义便成为日本实行社会全面改革、摆脱现有困境的可资利用的手段之一。

纵观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如果说明治维新是在外压下实行的国家转型，战后的政治改革是在外力下完成的国家转型，那么，当今日本将进行的则是内压下、由内力来完成的社会转型。现在，日本无疑又一次处在一场大变革的边缘，日本将再一次因对自己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做法、以及这些做法能否应对未来挑战产生怀疑而进行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不是因为安全威胁，而是因为日本经济日趋成熟，发展潜力似乎消耗殆尽，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全球化以及本国人口不断迅速老化等更为客观的内在因素而引起的。“尽管没有军事冲突这样意想不到的情况，但上述这些影响力并不亚于军事冲突。这些影响力是根本的且不可阻挡，他们将迫使日本进行选择。”^①这种情况下，新国家主义不是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政治理论，而只是日本保守政治形态中，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解决特定的问题，一种只具有特殊意义的、现实的政治政策理念与政治导向。它的

^① [美]米尔顿·埃兹拉蒂：《变——日本变局将如何改变世界均势》新华出版社2003年，沈建译，前言第7—8页。

结构是松散的，因为它并不具有真正的理论体系和理论框架，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人物。说它成形，是因为它借助于“新国家主义”这个含混然而却又鲜明的口号为战后一种思想的走向确定了某种形态，因而具有一种相对明显的方向性和鼓动性，并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所谓政策政治思想，是因为它与现实的政治权力接近；说它并非是一种政治思想理论，因为政治思想理论是对人类普遍政治现象的规律总结和认识，日本新国家主义显然不具有这种面对人类的普遍意义。新国家主义作为日本的一种政治政策思想和政治思潮，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声音。从历史发展的进程角度看，它包括日本对历史认识和反省的态度，对现实的思考选择与定位，以及对日本未来的方向把握；从政策范围看，既有对国内诸种问题的解决对策，更有与邻国、与亚洲及与世界的关系处理方针与策略；从执政党的利益角度考察，则是以什么样的国家发展政策最能获得选民的选票，吸引国民的注意力，整合社会的各种反对力量的问题。自民党作为战后长期执政的保守政党，一直把国家主义作为其政治理念的重要支柱之一^① 这是战后新国家主义得以存在、变化、发展的最重要政治基础。

从整体来考察 20 世纪 90 年代前的新国家主义，其中心是保守政治主流民族主义的日渐高扬。保守政治的民族主义把政权与政策的基调相结合，并在此将观念意识与政策相互作用，推进日本新国家主义。“这个推进的过程，从占领期刚过的 50 年代后半期开始 经过 60 年代、70 年代运动组织的强化和一定的政策实现，到 80 年代终于形成了以中曾根为代表的新国家主义路线。”通过这个过程，能够指出至此之前日本新国家主义的特质，主要有：第一，一以贯之的天皇意识观念。第二，与战前、战中型国家主义相连接，在战后条件

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第 254 页。

中再生。它不是向战前的简单回归，而是以在新条件下的适应之形式表现为“新”化。第三，新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国际主义”政治进行象征性调和，最后实现保守统治下的国民统合路线。^①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的新国家主义，面对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国际环境，日本战后社会长期累积的各类矛盾骤然爆发，各种社会思潮开始剧烈碰撞。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甚至整个日本社会都提出了日本必须改变国家战略的新主张。这期间新国家主义潮流在日本社会的上上下下剧烈涌动，这与中曾根时期自上而下的政权引导型新国家主义政治有明显的不同。它不再强调天皇意识形态的确立，或者说不再以天皇传统权威的恢复为统合国民意识的手段，相反强调日本必须适应冷战结束后新的世界格局，而有必要采取不同以往的新的政策手段。这一点也从对修改宪法的态度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冷战框架内，新国家主义政治家们在阐述修改宪法的理由时，无一例外都是说战后宪法是美国利用占领权力强加给日本的，因为不是日本自主制定的，所以才要修改。但是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政治家们在阐述修改宪法理由时，都相反强调战后宪法尽管给日本带来了民主与和平，但是再好的宪法也要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改变。现在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适应新的时代日本就必须尽快地改变，等等。

考察日本历史我们会发现，当社会处于迷茫、彷徨和动荡时，以国家利益为口号，往往能够发挥其他手段不能发挥的作用。特别是日本在经济领域已经实现成为世界大国的目标，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开始相互交织，经济问题仅仅依靠经济手段也已经不再奏效的情况下，新国家主义的主张重又成为解决日本政治问题、经济

[日] 德本正彦等著：《民族主义的动态》，九州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165 页。